

# 中古漢譯佛經偈頌體式研究

孫尚勇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後

**提要：**漢譯偈頌五、七言體和四、八句式在中古時期的地域特徵及其歷史演進，事實上與中國古代近體詩的四種主要體式——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七言四句、七言八句——的起源及發展有所關聯。漢譯偈頌雖源於梵胡文本之經典，但可視為譯家創作之詩歌作品，這一創作的現實基礎是古代譯家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而近體律絕的產生和演變與漢譯偈頌有著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古譯偈可以作為研究中古漢唐詩歌發展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參照系予以關注。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在資料保存的完整性上，漢譯偈頌要遠遠超過中古詩歌，尤其在先唐時期。

**關鍵詞：**漢譯佛經偈頌 體式 中古詩歌

## 一、前言

佛教文學研究已走過了一百年，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略有缺憾，關注佛教與中國文學之間關係者，其探討多注重於佛經原典的翻譯、頌讚、轉讀對中國文學如詩律、中古文學思潮的影響以及佛經原典中的敘事成分對中國古代戲曲、傳奇、小說的影響等方面；關注佛典本身文學性研究者，其探討多注重於經典敘事、說話藝術等方面。就佛教文學研究整體而言，翻譯佛典中偈頌之面貌及其詩學價值的研究顯得較為薄弱。本文擬就中古漢譯偈頌的面貌及其歷史發展作一整體概述，以期引起學人對此問題之關注。

為了獲得對中古佛經偈頌的直觀感受，我對中古譯偈作了全面統計，其範圍為《大正新脩大藏經》收錄之所有趙宋以前漢譯之佛經，這裡首先對本文的統計體例作些交待。

第一、凡同經異譯之各經均單獨列入統計，因為不同的譯家處於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文化和知識背景，他們所譯之偈頌都應視為一種再創造（包括同一譯家對同一偈頌的不同翻譯）。[註 1]

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

(一)闍那崛多等譯，《起世經》與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二者內容大體相同，文字亦基本相近，所有之偈頌除個別文字出入外亦無大的差別，故而在統計時以《起世經》為準，對《起世因本經》則僅計入一首，餘偈忽略不計[註 2]。

(二)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比丘何求坐樹下」七言七十二句偈及卷下「今覺佛極尊」五言八句偈，分別與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下〈出家品〉、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六〈降魔品〉、〈行道禪思品〉之兩首偈相近（前偈三經僅數字有異；後偈三經內容全同，《太子瑞應本起經》所載前四句與後四句和其他二經相同），故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的這兩偈本文忽略不計。又如「聽我歌十力」五言四十句偈，分別見於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七，本文祇計早出之支譯。

(三)隋·闍那崛多共笈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其中各卷分品與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有所不同，偈頌則絕大多數因襲了羅什譯本，我們僅計其中不見於羅什譯本之〈藥草喻品〉中的「譬如日月光」一偈，其餘則以羅什譯本作為準統計總偈數。

(四)西晉·竺法護譯，《須摩提菩薩經》與姚秦·鳩摩羅什譯《須摩提菩薩經》，二者皆有六言四句偈十首，相應各首僅個別字微有不同，故本文統計以竺法護譯本為準。

(五)元魏·佛馱扇多譯，《佛說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鄰尼經》所有之六首六言偈，與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所有之偈基本相同，本文統計取後者。

(六)唐·金剛智譯，《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與不空譯《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偈大致相同，本文統計取後者。

第二、一經之中或同一譯人所譯不同經中重出（字句全同）之偈則僅計作一首，餘重覆者則不計入。如見於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之「久見婆羅門」五言四句偈，廣見於同經之不同小經。又如西晉·法炬譯《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所載之「雖聞多惡名」五言十八句偈，與《雜阿含經》卷五十，第一三四四經之偈頌全同[註 3]，二經文字亦同。

第三、凡偈頌體經及專門載錄偈頌之經[註 4]，其中的偈頌皆不在統計範圍。這也有一些例外的情況。比如吳·維祇難譯《法句經》、晉·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三部經之間有著明顯的同源關係，三經的漢譯在偈頌上也存在明顯的承襲，因而，我們在對這三部經所涉偈作統計時以《法句譬喻經》為準，其他二經則不作統計。

第四、凡音譯咒語之類皆不作統計。如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卷一、卷二佛所說之「章句」，失譯附秦錄《大乘悲分陀利經》卷一之咒句，皆為音譯，不曉其義，體式亦完全自由，類此皆不計入總偈數。

第五、版本不統一的偈頌視具體情況或計或不計。如失譯經人名今附西晉錄《長壽王經》之「佛爲海船師」五言八十句偈[註 5]。此偈數見他經，詳略各有不同，但本經中此偈與散行經文義不相涉。據《大正藏》校註，一本無此八十句，故視之爲後來誤入本經者，不計入總偈數。

第六、對《大正藏》所收之同一譯者所譯同一經的不同版本，一般祇取年代較早的本子來計入總偈數。如西晉·竺法護譯《佛說鹿母經》，B 本比 A 本多出鹿子所說之「貪欲慕恩愛」五言二十四句偈一首，但偈首二句「貪欲慕恩愛，生爲母作子」的話卻明顯不應該是鹿子的口吻；此外，除鹿母所說「吾前生貪愛」五言八句偈兩種版本大致相同外，餘八首偈 B 本都較 A 本更爲繁複，或於 A 本偈之後增加篇幅，或將 A 本偈拆開再插入一些意義相近的句子。——就此而言，《佛說鹿母經》B 本未必可靠，因而，我祇取 A 本統計偈數。

第七、部分《大正藏》未排印爲偈頌，本文則判爲偈頌。典型者如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九〈魔怖菩薩品〉中八天神和淨居諸天所說[註 6]，今視爲偈。

第八、少量翻譯偈頌保存在中土註疏家的序疏著作之中，今一併計入。如見於釋道安《比丘大戒序》及竺曇無蘭《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的五言十三句偈一首：

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求於度世道。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譬如駛水流，日月不常住。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註 7]

第九、本文對偈頌的分判，以漢譯佛經中自然呈現出的單位爲依據。即如果佛經中交代說偈者之下，再無其他文字交代者，都視爲一首。如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華手經》卷四的「世尊大智慧無邊」七言二百二十句偈，儘管偈前經云：

時觀佛定善根莊嚴菩薩，手執眾華，遙散此界，以其本願因緣力故，於諸國土無所罣礙，逕來到此娑婆世界，至王舍城詣竹園中。時會四眾怪未曾有，是眾蓮華遶佛三匝，於佛前住，各說一偈，稱揚如來及菩薩言：……

但此偈並未自然分段。類此者，本文皆視作一首偈。案佛經目錄書中通常用多少多少「偈」來表述某經之篇幅，然偶有例外用「首」者。如《祐錄》卷四《雜譬喻經》一卷下註云：

安法師載《竺法護經目》有《譬喻經三百首》二十五卷，混無名目，難可分別。

同卷《五言詠頌本起》一卷下註云：「百四十二首。」[註 8]卷五《新集疑經偽撰雜錄》有天監二年釋道歡撰《眾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註 9]。卷十三《竺法護傳》云：

惠懷之際，有沙門法炬者，不知何許人，譯出《樓炭經》。炬與沙門法立共出《法句喻》及《福田》二經。法立又訪得胡本，別譯出百餘首。未及繕寫，會病卒。尋值永嘉擾亂，散滅不存。[註 10]

以上四例，其「一首」相當於「一偈」或其他，不詳。

以上交代了本文對漢譯佛經偈頌的統計體例，這些都是在翻檢佛藏時逐步明確下來的，儘管筆者竭力遵循這些體例，但由於經卷浩繁，瞻前顧後，勢頗不易。因而本文的統計與漢譯偈頌的本來面貌可能存在略微出入。比如漢譯偈頌在不同時代、不同譯經中的重覆出現，筆者雖注意了剔除語句完全重覆者，但可能有所遺漏。又少數對佛教偈頌作闡釋的經卷，統計起來就有一個取舍問題，這也有一定難度。如後魏·毘目智仙共瞿曇流支譯《迴諍論》，此乃解釋偈頌之經，它與偈頌體佛經性質相類，其中經文開篇有五言八十四句、五言二百四句偈各一首，而餘下之偈皆為這兩首偈的部分的重覆解釋，筆者僅計開篇之二首偈，餘則未計，但這種省略是否確當也許可以作進一步探討。再有隋·達磨笈多譯《緣生論》，其第一首偈為五言一百二十二句，偈後經云「緣生三十論本竟。緣生三十論，我當隨順次第解釋」[註 11]，此下有三十首偈均為第一偈的部分重出並作解釋，但經末又別出一首五言十二句偈，故而本文統計了經文中的第一首和最後一首。類此說明統計佛經偈頌的數量是相對的。

根據上述體例，本文統計涉及佛經六百九十餘部，譯偈二萬三千四百七十首。下文結合圖表，就這些譯偈的體式特徵及其歷史發展加以分析。

## 二、漢譯偈頌的體式

據表一，五言是漢譯偈頌最爲常用的一種體制，佔到了總數的八二・四九%；其次是七言，佔一二・六七%；再次是四言和雜言，分別佔三・一六%、一・〇三%。可以看出，三言、六言、八言、九言處於更爲次要的地位。

表一：中古漢譯偈頌的體制

體制	二言	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雜言
數量	1	10	742	79361	124	2973	17	1	241
百分比	/	/	3.16	82.49	0.59	12.67	/	/	1.02

漢譯偈頌使用的句式多達二百八十五種，短者一句，長者三千六百六十二句，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姿的特點。由表二可知：

表二：中古漢譯偈頌的句式

句式	數量	句式	數量	句式	數量	句式	數量	句式	數量	句式	數量	句式	數量	句式	數量
1	101	38	50	76	50	122	5	180	7	252	5	378	1	644	1
2	1009	39	6	77	3	124	21	182	4	256	4	380	1	648	1
3	83	40	515	78	18	125	2	184	8	257	1	384	1	660	1
4	10826	41	6	79	2	126	8	186	3	258	2	386	1	675	1
5	126	42	36	80	126	127	2	188	4	260	2	388	2	678	1
6	1021	43	8	81	3	128	24	189	1	265	1	392	1	718	1
7	68	44	145	82	12	129	1	190	2	268	1	396	1	796	1
8	3021	45	5	83	2	130	3	192	5	272	1	398	1	814	1
9	49	46	29	84	58	131	1	194	1	274	1	400	3	850	1
10	398	47	5	85	3	132	10	196	8	280	1	401	1	862	1
11	36	48	130	86	9	134	1	198	1	283	1	402	1	880	1
12	1066	49	6	87	2	135	1	199	1	290	1	404	3	912	1
13	19	50	24	88	39	136	22	200	2	292	2	406	1	916	1
14	220	51	1	89	3	138	3	204	9	294	1	410	1	924	1
15	29	52	88	90	11	139	1	207	1	296	1	414	1	966	1
16	815	53	6	91	2	140	14	208	6	312	1	416	2	1052	1
17	14	54	21	92	22	143	1	212	2	314	1	419	1	1112	1
18	138	55	1	93	1	144	7	213	1	316	1	428	1	1156	1
19	14	56	84	94	9	146	3	216	1	320	4	430	1	1338	1
20	465	57	3	96	42	148	6	217	1	322	1	440	1	1370	1
21	14	58	20	98	10	150	3	218	2	328	2	452	1	1430	1
22	107	59	2	99	2	152	11	220	9	332	1	460	1	1462	1
23	9	60	79	100	33	154	3	222	1	336	3	468	1	1767	1
24	361	61	3	101	1	155	1	224	1	340	1	472	1	2524	1
25	11	62	20	102	10	156	6	226	1	342	2	476	1	2658	1
26	80	64	87	103	24	157	1	228	3	344	1	480	2	3662	1
27	8	65	1	106	2	158	3	230	1	346	1	484	4		
28	203	66	13	108	11	160	19	232	3	348	2	490	1		
29	4	67	1	110	6	162	1	234	1	350	1	502	2		
30	58	68	41	112	19	164	13	236	1	352	3	506	1		
31	6	69	1	114	3	166	5	238	1	354	1	524	1		
32	287	70	14	115	1	168	14	239	1	356	1	540	1		
33	6	71	2	116	16	170	3	240	7	358	2	548	1		
34	56	72	45	118	3	172	8	244	3	360	3	553	1		
35	4	73	2	119	1	174	2	247	1	362	3	560	1		
36	133	74	12	120	38	176	9	248	4	364	2	600	1		
37	5	75	1	121	1	178	1	250	2	376	3	606	1		

(一)數量在千首以上者依次為四句式一萬零八百二十六首、八句式三千零二十一首、十二句式一千零六十六首、六句式一千零二十一首[註 12]，分別佔到漢譯偈頌總數的四六·一三%、一二·八七%、四·五四%、四·三五%。這表明四句、八句兩種句式在漢譯偈頌中佔據較大的比例，尤以四句式為最。

(二)數量在千首以下百首以上者為：十六句八百一十五首、四十句五百一十五首、二十句四百六十五首、十句三百九十八首、二十四句三百六十一首、三十二句二百八十七首、十四句二百二十首、二十八句二百零三首、四十四句一百四十五首、十八句一百三十八首、三十六句一百三十三首、四十八句一百三十首、五句一百二十六首、八十句一百二十六首、二十二句一百零七首。這十五種句式能被整齊地分割成四句式的有十種，能被整齊地分割成八句式的有六種。

(三)上述十九種句式是漢譯偈頌的主要形態，而百句以上的偈頌，多者大都在十首上下，許多句式僅有一首，這表明百句以上的長篇並非漢譯佛經偈頌的主流。而其中數量稍大者，如一百句三十三首、一百二十句三十八首、一百二十八句二十四首、一百三十六句二十二首等幾種句式，它們也能整齊地分割成四句式或八句式。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漢譯偈頌的句式不僅以四句、八句為最多，而且長篇作品則表現出明顯的以四句或八句構成詩節單位的趨勢。漢譯偈頌句式上的這種特點，既與佛經原典偈頌的韻律規則有著不可否認的淵源，更與漢譯偈頌的翻譯體例有著較為密切的關聯[註 13]。

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知道，漢譯偈頌的體制以五言和七言為多，句式則以四句和八句為多；結合表三和表四，可以進一步確定，五言四句（九千三百八十首）、五言八句（二千五百七十首）、七言四句（一千一百九十首）、七言八句（三百三十五首）是漢譯偈頌中最為重要的幾種體式，它們分別佔總偈數的三九·九七%、一〇·九五%、五·〇七%、一·四二七%。

表三：中古漢譯偈頌四句式的分布

體制	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雜言
數量	2	201	9380	41	1190	5	7

表四：中古漢譯偈頌八句式的分布

體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雜言
數量	87	2570	12	335	1	16

### 三、中古歷朝譯偈概況

#### (一)後漢

今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簡稱《祐錄》）、隋·法經等《眾經目錄》（簡稱《法錄》）、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簡稱《房錄》）、唐·智昇《開元釋教錄》（簡稱《開錄》）、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簡稱《呂錄》）[註 14]等，並部分參考了任繼愈主編

《中國佛教史》，稽屬後漢所譯有偈之經十二部（下文對各朝譯經之確立同此）：安世高《佛說七處三觀經》、《五陰譬喻經》，支婁迦讖《佛說般舟三昧經》（一卷）、《佛說般舟三昧經》（三卷），支曜《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康孟詳《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失譯《佛說魔嬈亂經》、《六菩薩亦當誦持經》、《禪要經》、《受十善戒經》、《分別功德論》。以上譯偈九十六首。

由表五可知，後漢譯偈的各種體制，以五言和七言居多；它們分別佔總數的六六·六七%、一九·七九%。後漢譯偈使用句式二十九種，表六所列為三首以上的句式，其中以四句和八句居多，分別佔總數的一六·六七%、二一·八八%。中古漢譯偈頌中唯一的九言體作品就出現在漢代，這對研究中古詩歌顯然是有意義的。從上面的統計可以發現，中古漢譯偈頌的體制奠基於後漢時代。

表五：後漢譯偈的體制

體制	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九言	雜言
數量	1	4	64	4	19	1	3
百分比	1.04	4.17	66.67	4.17	19.79	1.04	3.13

表六：後漢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8	12	16	20	24	28	32	40	48
數量	16	21	6	7	3	10	3	4	3	3
百分比	16.67	21.88	6.25	7.29	3.13	10.42	3.13	4.17	3.13	3.13

(二)三國

今考屬三國所譯有偈之經二十一部：吳·支謙譯《梵摩渝經》、《菩薩本緣經》、《佛說月明菩薩經》、《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佛說義足經》、《撰集百緣經》、《佛說菩薩本業經》、題曹魏·白延譯《佛說須賴經》[註 15]、《佛說維摩詰經》、《私呵昧經》、《菩薩生地經》、《佛說八師經》、《佛說慧印三昧經》、《佛說李經抄》、《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舊雜譬喻經》，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註 16]，失譯題吳·支謙譯《弊魔試目連經》、附吳魏二錄《雜阿含經》、題東晉·竺曇無蘭譯《佛說水沫所漂經》[註 17]。以上譯偈二百首。

表七：三國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雜言
數量	36	102	45	1	2	14
百分比	18.00	51.00	22.50	0.50	1.00	7.00

表八：三國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8	12	16	24	32	40
數量	70	30	9	17	7	12	8
百分比	35.00	15.00	4.50	8.50	3.50	6.00	4.00

案表八所列出的是三國譯偈三首作品以上的句式。通過表七、表八，我們發現三國譯偈較後漢表現出了一些不同的面貌。在各種體制中，三國譯偈四言、五言、六言佔主導地位，分別佔總數的一八·〇〇%、五一·〇〇%、二二·五〇%；與後漢相比，四言和六言的比重有了較大的增加，五言的比重則有所下降。在各種句式中，四句和八句同樣在三國譯偈中為多數，分別佔總數的三五·〇〇%、一五·〇〇%；與後漢相比，四句式有了相對的增多。據史載，後漢·安世高等譯家主要活動於洛陽一帶[註 18]，而三國最大的譯家支謙、康僧會則主要活動於武昌和建康一帶；初步判斷，除去所翻佛經本身的因素之外，上述後漢、三國譯

偈在體式上表現的差異是地域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影響所致[註 19]。後漢時代的譯經大多完成於建安十二年以前[註 20]，亦即由「鄴下文人集團」形成而在文壇出現「五言騰踊」局面之前[註 21]，並且，史籍也難覓早期譯家與上層文人交往的記載；因而，後漢譯偈以五言為主的特點當是受到北方民間文化的影響而致。源於漢末，經歷孫吳、東晉「稍有增廣」的吳聲西曲，其句式便以四句為主；四句式在三國譯偈中的優勢，也可從斯時南方文化中找到一些對應，然而由於譯家對中土文化的些許隔膜使得這種影響並不強烈。

### (三)西晉

西晉譯經有偈者凡一百十七部。這裡不一一列出，僅就年代歸屬上與《大正藏》題名有出入的三十四部作簡要說明如下：

題後漢·安世高譯《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迦葉結經》、《佛說奈女祇域因緣經》、《佛說自誓三昧經》，據《祐錄》、《房錄》、《呂錄》，改隸竺法護。

題後漢·安世高譯《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佛說婆羅門避死經》、《阿那邠邸化七子經》、《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佛說犯戒罪報輕重經》，《祐錄》失譯，今附西晉。

題後漢·安世高譯《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祐錄》失譯，《呂錄》入疑偽，今附西晉。

題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據《祐錄》，改隸竺法護。

題後漢·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祐錄》失譯，今附西晉。

題後漢·支曜譯《佛說阿那律八念經》，《祐錄》失譯，《呂錄》附西晉錄。

題後漢·康孟詳譯《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據《祐錄》，竺法護。

題後漢·康孟詳譯《佛說興起行經》，《祐錄》失譯，今附西晉。

後漢失譯人名《佛說安宅神咒經》，《祐錄》失譯，《呂錄》入疑偽，今附西晉。

失譯人名在後漢錄《大方便佛報恩經》，《祐錄》失譯，今附西晉。

題吳·支謙譯《佛說梵志阿毘經》，《祐錄》失譯，註云：「抄《阿含》。」《呂錄》云支謙誤。今附西晉。

題吳·支謙譯《須摩提女經》，《祐錄》失譯，《呂錄》附西晉錄。

題吳·支謙譯《佛說獬狗經》，《祐錄》失譯，今附西晉。

題吳·支謙譯《佛說黑氏梵志經》、《佛說長者音悅經》，《祐錄》失譯，《呂錄》附西晉錄。

題吳·支謙譯《佛說須摩提長者經》，《法錄》失譯，云「古錄備有」，今附西晉。

題吳·支謙譯《佛說八吉祥神咒經》，《祐錄》失譯，今附西晉。

題吳竺律炎共支謙譯《摩登伽經》，《法錄》失譯，《呂錄》云作竺律炎等誤，今附西晉。

僧祐錄云安公古典是般舟三昧經初異譯《拔陂菩薩經》，今附西晉。

題元魏·吉迦夜譯《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祐錄》失譯，《呂錄》附晉錄。



題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祐錄》失譯，《呂錄》附西晉錄。  
 題劉宋·沮渠京聲譯《佛說進學經》，《祐錄》失譯，《呂錄》附西晉錄。  
 題東晉·竺曇無蘭譯《五苦章句經》，《祐錄》失譯，《呂錄》附西晉錄。  
 題劉宋·求那跋摩譯《優婆塞五戒威儀經》，《祐錄》失譯，今附西晉  
 失譯《佛說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今附西晉。  
 統計得西晉譯偈一千六百五十三首。

表十所列是西晉譯偈中三十首作品以上的句式。通過表九和表十，西晉譯偈的體式與三國時期相比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在各種體式中，四、五、七言居多，它們分別佔總數一〇·一〇%、六八·三〇%、一三·七九%。其中，六言比重較三國譯偈有明顯下降（西晉三·五一%，三國二二·五〇%）；七言比重則有明顯的提高，與後漢譯偈接近；五言比重則略有提高，與後漢譯偈相當。在各種句式中，四句和八句較多，十二句和十六句也有較大提高，它們分別佔總數的二三·四一%、二七·一六%、六·四一%、一〇·四七%。其中八句式最多，這與三國相異，而與後漢相同。

表九：西晉譯偈的體制

體制	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雜言
數量	6	167	1129	58	228	11	54
百分比	0.36	10.10	68.30	3.51	13.79	0.67	3.27

表十：西晉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8	12	16	20	24	32	40	64	80
數量	387	449	106	173	53	39	34	54	31	37
百分比	23.41	27.16	6.41	10.47	3.21	2.36	2.06	3.27	1.88	2.24

以上的比較表明，在體式特點上，西晉譯偈與三國不相類，而遠接後漢。這仍然可從地域文化的差別中找到一些解釋。在有偈的西晉百十七部譯經中，竺法護所譯者達到五十七部，超過了半數；而且，從各經譯偈的數量來看，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三百三十二首、《生經》一百零一首、《佛說普曜經》九十五首、《正法華經》八十六首、《大哀經》七十三首、《度世品經》五十首、《佛說如來興顯經》四十七首，僅這七部經偈頌數量就將近佔到了西晉所有譯偈的五〇%。——因而，我們可以通過竺法護這一個案來探討西晉翻譯佛經的基本狀況。據《祐錄》，法護先月支人，世居敦煌，其譯經活動主要在由敦煌至長安、洛陽這一東西交通線上，長安則處中心位置；也就是說，法護譯經的地點是在北方。由此，西晉譯偈遠於三國而近於後漢也是情理之中了。

值得注意的還有，在中古所有漢譯偈頌中，九言體僅有一首，出現在漢代；八言共有十七首，三國二首，西晉十一首，佔七六·四七%；六言體共有一百二十四首，其中三國四十五首，西晉五十八首，佔八三·〇六%；這說明後漢到西晉時期，是中古漢譯偈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探索期。

#### (四)東晉十六國

##### 1. 東晉

東晉有偈之譯經二十五部：帛尸梨蜜多羅譯《佛說灌頂經》，曇無蘭譯《佛說寂志果經》、《佛說自愛經》、《迦葉赴佛般涅槃經》，僧伽提婆譯《三法度論》、《阿毘曇心論》、《中阿含經》、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方等如來藏經》、《佛說觀佛三昧海經》、《達摩多羅禪經》、《佛說出生無量門持經》，竺難提譯《大寶積經·大乘方便會》、《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大般涅槃經》，祇多蜜譯《佛說寶如來三昧經》，失譯《般泥洹經》、《佛說古來世時經》、《佛說菩薩本行經》、《盧至長者因緣經》、《佛說造立形像福報經》、《佛說因緣僧護經》、《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東晉譯偈九百一十九首。

表十二所列為東晉譯偈中十三首作品以上的句式。從表十一和表十二可知，在體制的選擇上，東晉譯偈與前此相比最為單一，五言佔總數的八八·二五%，這時沒有了三言、八言。在所有句式中，東晉譯偈的四句式比重最大，佔三六·四五%；其次則是四十句式，佔一一·一〇%，這說明，東晉時代，中古漢譯偈頌的句式一方面趨於穩定，另一方面則趨於長篇；而且，此階段二句式、六句式則較以前有所增加，這似乎表明漢譯偈頌的翻譯體例在本時期有一些細微的變化。上述部分現象，與譯出佛典類別的變化有關，如二句式主要集中在僧伽提婆譯《三法度論》（有五言二句偈二十一首），四句式主要集中在僧伽提婆共惠遠譯《阿毘曇心論》（有五言四句偈二百二十四首），六句式主要集中在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有五言六句偈三十六首），四十句式則主要在大乘華嚴部經典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有五言四十句偈七十一首、七言四十句偈二十二首）。

表十一：東晉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雜言
數量	27	811	3	63	15
百分比	2.94	88.25	0.33	6.86	1.63

表十二：東晉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2	4	6	8	10	12	16	20	32	40
數量	22	335	69	77	21	21	19	18	13	102
百分比	2.39	36.45	7.51	8.38	2.29	2.29	2.07	1.96	1.41	11.10

## 2.五涼

五涼，實際譯經流傳至今者僅前涼和北涼，題稱「五涼」，因循而已。五涼有偈之經十九部：支施崙譯《佛說須賴經》，道龔譯《大寶積經·寶梁聚會》，法眾譯《大方等陀羅尼經初分》，曇無讖譯《金光明經》、《菩薩地持經》、《悲華經》、《大方等大集經》、《大般涅槃經》、《菩薩戒本》、《大方廣三戒經》、《大方等無想經》，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道泰譯《大丈夫論》、《入大乘論》，失譯《大方廣十輪經》、《不退轉法輪經》、《佛說長者法志妻經》、《優婆夷淨行法門經》、《金剛三昧經》（案此經《呂錄》入疑偽）。五涼譯偈六百四十二首。

表十四所列為五涼譯偈十首以上的句式。從表十三和表十四可知，五涼佛經翻譯活動集中於涼州地區，其譯偈與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東晉、以及前此地域相近的西晉譯偈均有所不同。在體制上，五涼譯偈基本上為四、五、七言三種，分別佔總數的一七·四五%、五七·〇一%、二五·二三%；其中四言和七言的比率較西晉有所提高，五言的比率則有所下降，它們在使

用頻率上比西晉顯得更為接近：這也是五涼譯偈與東晉譯偈的不同之處。在句式上，五涼譯偈亦以四句和八句為多，但四句明顯多於八句，與西晉不同而近於東晉。以上特點與五涼譯經的類別相關，如四句式也集中於論藏之中（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有五言四句偈七十五首）。

表十三：五涼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七言	雜言
數量	112	366	162	2
百分比	17.45	57.01	25.23	0.31

表十四：五涼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6	8	10	12	16	20	24	28	32
數量	261	18	97	11	32	22	22	16	15	18
百分比	40.65	2.80	15.11	1.71	4.98	3.43	3.43	2.49	2.34	2.80

### 3. 三秦

三秦有偈之譯經六十六部，這裡不一一列舉。其中題姚秦·筏提摩多譯《釋摩訶衍論》、題姚秦·竺佛念譯《菩薩瓔珞本業經》、題後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呂錄》俱入疑偽，今皆暫附三秦一並論之[註 22]。三秦譯偈三千八百九十五首。

表十六所列為三秦譯偈五十首以上的句式。由表十五和表十六可知，三秦譯偈與大致同時期的東晉、五涼均有所不同。在體制上，三秦譯偈以五言最多，佔總數的九〇・七八%，這在歷代漢譯偈頌中比例是較高的；但其中亦有少量的六言和八言，較東晉、五涼譯偈略顯豐富。在句式上，三秦譯偈亦以四句為多，其次是八句。因而，三秦譯偈的體制的特點與地域更為相近的西晉譯偈相近，句式特點則與東晉和五涼相近；前者可由地域文化的影響中找到依據，後者則可由翻譯經典的類中獲得解釋（三秦譯偈中的四句式主要集中於論藏，如鳩摩羅什《中論》有五言四句偈三百二十四首，僧伽跋澄等《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有五言四句偈一百七十二首，鳩摩羅什《十住毘婆沙論》有五言四句偈一百六十二首；其次是小乘經藏，如曇摩難提共竺佛念《增壹阿含經》有五言四句偈一百七十六首，失譯《別譯雜阿含經》有五言四句偈一百五十二首）。

表十五：三秦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雜言
數量	148	3536	11	173	4	23
百分比	3.80	90.78	0.28	4.44	0.10	0.59

表十六：三秦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2	4	6	8	12	14	16	20	24	32
數量	52	1681	224	593	244	70	154	90	87	50
百分比	1.34	43.16	5.75	15.22	6.26	1.80	3.95	2.31	2.23	1.28

根據上文的統計，東晉十六國共有偈頌五千四百五十六首。綜合前計，將這一歷史時期譯偈的特點列如下表。其中，主要句式選擇了在表十二、表十四和表十六都曾出現者。

表十七：東晉十六國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雜言
數量	287	4713	14	398	4	40
百分比	5.26	86.38	0.26	7.29	0.073	0.73

表十八：東晉十六國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6	8	12	16	20	32
數量	2277	311	767	297	195	130	81
百分比	41.73	5.70	14.06	5.44	3.57	2.38	1.48

### (五)南北朝

#### 1. 劉宋

劉宋有偈之譯經四十一部，其中題梁·僧伽婆羅譯《八吉祥經》（有五言四十二句偈一首），今據《祐錄》、《呂錄》歸屬求那跋陀羅。劉宋共有偈頌一千九百四十六首。

表二十所列為劉宋譯偈二十五首以上的句式。從表十九和表二十可知，劉宋譯偈與前代相比也表現出了一些不同的特點。在體制上，五言佔到九六·四〇%，在歷代漢譯偈頌中比例是最高的；四言和七言的比例則較前代均有明顯的降低（劉宋譯偈中亦有六言，如劉宋·先公譯《佛說月燈三昧經》的十二首雜言偈，皆由六言和七言構成）。在句式上，四句式佔五二·七七%，在歷代譯偈中也是比例最高的。

表十九：劉宋譯偈的體制

體 制	四言	五言	七言	雜言
數 量	27	1876	27	16
百分比	1.39	96.40	1.39	0.82

表二十：劉宋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 式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數 量	1027	167	204	65	83	35	55	25	25
百分比	52.77	8.58	10.48	3.34	4.27	1.80	2.82	1.28	1.28

#### 2. 齊梁陳

齊梁陳有偈之譯經四十二部。其中，陳·真諦譯《遺教經論》、《大乘起信論》、《大宗地玄文本論》，失譯《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呂錄》皆入疑偽，今暫附此。齊梁陳有偈一千二百三十六首。

表二十二所列為齊梁陳譯偈中二十七首以上的句式。從表二十一和表二十二可知，齊梁陳譯偈與前此的劉宋略有不同。體制上，五言仍佔絕對多數，但四言和七言的比例較劉宋有所提高。綜觀上文統計，自西晉以降，四言、五言和七言成為翻譯偈頌的三種主要體制，至南朝，後漢三國譯偈所常使用的三言、六言、八言、九言逐漸被後來的譯家所忽略。句式上，四句和八句較多而以四句為主，但此時二句偈比例較前代均有大幅度提高（主要見於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中邊分別論》，各有五言二句偈二十一首和四十三首）。

表二十一：齊梁陳譯偈的體制

體 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雜言
數 量	57	1091	1	79	8
百分比	4.61	88.27	／	6.39	0.65

表二十二：齊梁陳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 式	2	4	6	8	10	12	16
數 量	95	641	90	150	42	46	27
百分比	7.69	51.86	7.28	12.14	3.40	3.72	2.18

#### 3. 北朝

北朝有偈之經六十二部，包括了隋·那連提耶舍和闍那崛多入隋之前的譯作，計偈頌二千零一十五首。

表二十四所列為北朝譯偈中二十八首以上的句式。本文所涉之北朝譯經，據唐·靖邁《古今譯經圖記》卷三，出經時間最早者為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慧覺等譯《賢愚經》，當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僅有偈七首。其餘各經較早者為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據《祐錄》，延興二年（四七二）出，已是劉宋末年。也就是說，北朝的大部分譯經其出經時間均與南朝齊梁陳相當，那麼，北朝譯偈與齊梁陳譯偈就具有可比性。從表二十三和表二十四可知，北朝譯偈與齊梁陳譯偈存在一定的相異之處。體制上，北朝譯偈也以五言最多，與齊梁陳比例相當；而在七言體的使用上，北朝則明顯較齊梁陳多出了三個百分點以上。句式上，北朝譯偈中長篇的比重明顯高於齊梁陳。

表二十三：北朝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雜言
數量	22	1789	1	193	10
百分比	1.09	88.78	/	9.58	0.50

表二十四：北朝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6	8	12	16	20	24	32	40	48
數量	1070	31	193	72	68	45	63	45	29	28
百分比	53.10	1.54	9.58	3.57	3.37	2.23	3.13	2.23	1.44	1.40

根據上文的統計，南北朝共有偈頌五千一百九十七首。綜合前計，將南北朝時期譯偈的體制和句式特點列成下面的表格。其中，主要句式選擇了在表二十、表二十二、表二十四均曾出現者。

表二十五：南北朝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雜言
數量	106	4756	2	299	34
百分比	2.04	91.51	/	5.75	0.654

表二十六：南北朝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6	8	12	16
數量	2738	288	547	201	150
百分比	52.68	5.54	10.53	3.87	2.89

## (六)隋

隋有偈之譯經四十三部，其中附入《開元錄》云「近代所集」的《佛說佛名經》（有偈九首）。隋譯偈共一千三百一十首。

表二十八所列為隋譯偈中二十四首以上的句式。從表二十七和表二十八可知，隋代譯偈與前此各代都有不同。句式上，隋代譯偈與北朝相近，長篇偈頌佔有一定的比率，這或許與出經地點都屬北方有關。體制上，隋代譯偈雖與前代一樣以五言和七言為主，但其七言卻要高於五言近三個百分點，這在歷代譯偈中是獨一無二的。

表二十七：隋譯偈的體制

體制	四言	五言	七言	雜言
數量	54	596	634	26
百分比	4.12	45.50	48.40	1.98

表二十八：隋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4	5	6	8	12	16	20	24	32	40
數量	590	36	26	193	61	46	43	25	24	35
百分比	45.04	2.75	1.98	14.73	4.66	3.51	3.28	1.91	1.83	2.67

(七)唐

唐代偈頌涉及譯經二百四十三部，共有偈頌九千五百五十八首。

表三十所列為唐譯偈中一百首以上的句式。從表二十九和表三十可知，唐代譯偈體制以五言為主，七言次之；句式以四句、八句為多，二句也不少。同前代譯偈相仿，唐代二句式偈頌也主要集中於論藏中，如唐·波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釋》、玄奘譯《阿毘達磨藏顯宗論》、《阿毘達磨順正理論》、《阿毘達磨俱舍論》，分別有五言二句偈一百六十三、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九、一百三十五首。在各種句式中，唐代譯偈中十二句和四十句、十六句也較多，這與東晉和北朝的句式選擇相近。

表二十九：唐譯偈的體制

體制	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	雜言
數量	3	88	8001	1395	70
百分比	／	0.92	83.71	14.60	0.73

表三十：唐譯偈的主要句式

句式	2	4	6	8	10	12	16	20	40
數量	811	4728	373	1014	138	386	227	148	228
百分比	8.49	49.47	3.90	10.61	1.44	4.04	2.37	1.55	2.39

四、中古漢譯偈頌的發展

綜合上文的統計與分析，我們瞭解到，作為中古佛經偈頌翻譯的三種最常見的體制，四言、五言和七言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漢譯偈頌中佔據著不同的位置。而其他各種體制中，九言在三國以降就再無嗣響，三言在西晉以後基本上不被使用，六言、八言則在東晉十六國以後也逐漸退出了譯家的視野。這與中古詩歌發展或許存在某種關聯。儘管蕭統在《文選序》中說漢梁之間詩歌「各體互興，分鑣並驅」，然而早在西晉時期，摯虞早說過「古詩之九言者，『澗酌彼行潦浥此注茲』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註 23]；結合漢譯佛偈的情況，摯虞的話或有一定道理。以下首先就中古譯偈四、五、七言的地域特徵作一考察。

由表三十一可知，漢隋偈頌中四言的比例，北方較南方高一·八五七個百分點；五言，南方比北方高一·四五個百分點；七言，北方比南方高一〇·七一個百分點。從這些數據來看，漢隋譯偈四言在南方和北方的使用頻率比較接近；五言，南方明顯高於北方；七言，北方明顯高於南方。我們知道，漢魏六朝時期，五、七言逐漸取代《詩經》的四言體，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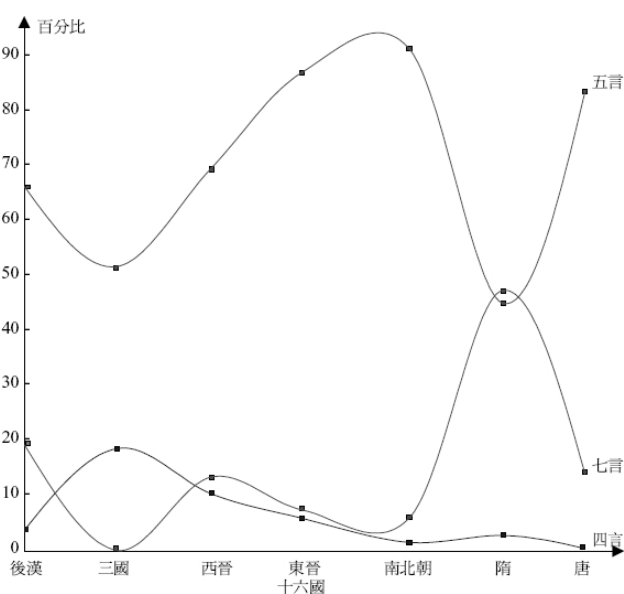
表三十一：漢隋譯偈四、五、七言體的地域分布

地域	北方						南方			
	後漢	西晉	五涼	三秦	北朝	隋	三國	東晉	劉宋	齊梁陳
偈數	96	1653	642	3895	2015	1310	200	919	1946	1236
總計	9611						4301			
四言數	4	167	112	148	22	54	36	27	27	57
合計	507						147			
比率	5.275%						3.418%			
五言數	64	1129	366	3536	1789	596	102	811	1876	1091
合計	7480						3883			
比率	77.83%						90.28%			
七言數	19	228	162	173	193	634	1	63	27	79
合計	1409						170			
比率	14.66%						3.95%			

而發展成爲中國古典詩歌最重要的兩種體制。關於這兩種詩體的起源，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中一個始終備受關注卻一直未能得到完滿解決的重大學術課題。表三十一所顯示的南北譯偈在五言、七言體的地域差異，或許對研究這一課題不無啓發；換言之，在中古前期，五、七言體分別代表了南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徵，五言可能源於南方，七言則源於北方。具體到中古詩體的討論留待下文，這裡我們以上文表五、七、九、十七、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的統計數據，來看看中古時期四、五、七言三體在不同歷史時期漢譯佛偈中的發展軌跡。

由圖一可知，五言在中古漢譯佛偈中一直佔據著最爲重要的地位，其比重在中古各階段的起伏不大，三國時期有一明顯下降的趨勢，西晉至南北朝時期則不斷增加並達到最高點，經歷了隋的低谷之後到唐代又有了明顯的提高；七言的比重在後漢至三國時期顯著下降至最低點，西晉時又有所提高，歷東晉南北朝逐漸下降，而在隋達到了最高，至唐代又表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四言的使用在三國期間達到最高點，之後雖有小的起伏，但基本上是逐漸趨於式微。由圖一還可以看出，三國和隋是比較特殊的兩個時段：三國時期，五言是中古歷代譯偈比率第二低的，七言爲歷代最低，四言卻是歷代最高的；隋代則是歷代譯偈中五言比率低和七言比率最高的時期，即五言體和七言體變動最爲劇烈的時期。

圖一：中古譯偈主要體制的演進



上文統計表明，中古譯偈的句式以四句和八句爲主，在上列表六、八、十、十八、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中都曾出現的句式還有十二句和十六句，這四種句式也是在表二中所反映出的除六句式以外作品數量最多的四種。這裡我們擬就中古不同階段的譯偈中四句式 and 八句式的發展作些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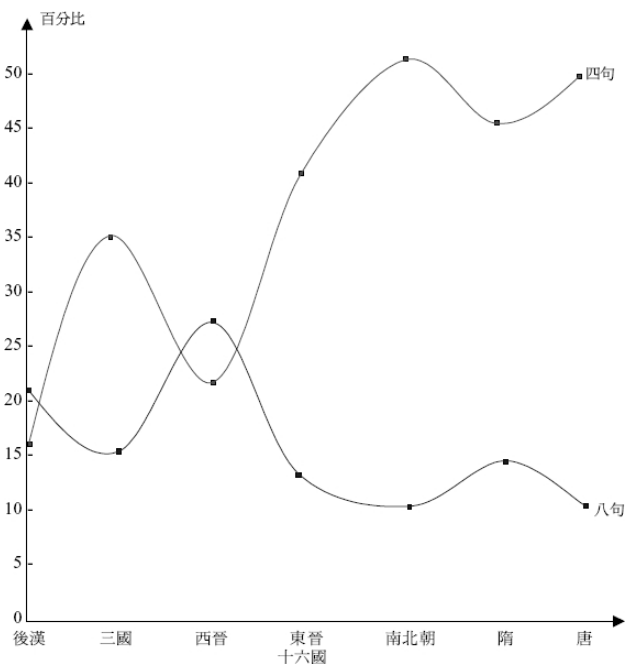
如表三十二所示，四句式在北方各朝譯偈中佔四一·六七%，在南方各朝則佔到四八·二〇%；八句式在北方佔一六·〇九%，在南方則佔一〇·七二%；四句式，南方比北方高六·五三個百分點以上；八句式則正相反，北方比南方高五·三九個百分點。如果拿中古詩歌來作比附，是否存在近體絕句主要源於南方文化，而

表三十二：漢隋譯偈四句、八句式的地域分布

地域	北方						南方			
	後漢	西晉	五涼	三秦	北朝	隋	三國	東晉	劉宋	齊梁陳
總偈數	9611						4301			
四句數	16	387	261	1681	1070	590	70	335	1027	641
合計	4005						2073			
比率	41.67%						48.20%			
八句數	21	449	97	593	193	193	30	77	204	150
合計	1546						461			
比率	16.09%						10.72%			

近體律詩則主要源於北方文化這樣的可能呢？

圖二：中古漢譯偈頌主要句式的演進



從圖二可以看出，譯偈四句式在三國時期有一個相對的高峰，經歷了西晉的低谷，至東晉南北朝達到最高峰，此後在隋唐持續穩定地發展著。八句式則在三國時期經歷了一個低谷之後，在西晉達到高峰期，此後至南北朝呈遞減式發展，隋唐時期起伏不大。與前面對譯偈句式地域性的分析相關，圖二中的三國和西晉頗能引起注意，三國，譯偈的四句式達到了第二高峰，八句式則處於相對的低谷；西晉，四句式處於相對低谷，八句式則達到中古時期的高峰期。根據上文的分析，三國譯偈主體在南方，西晉譯偈的主體則在北方，這與上文據表三十二所得出的推論——近體絕句主要源於南方文化，而近體律詩則主要源於北方文化——是相符合的。

以下結合上文的相關統計，對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七言四句、七言八句四種體式在中古譯偈中的狀況作初步的探討。

表三十三：漢隋譯偈主要體式的地域分布

地 域	北 方						南 方			
	後漢	西晉	五涼	三秦	北朝	隋	三國	東晉	劉宋	齊陳
總偈數	9611						4301			
五言四句	15	218	182	1521	1026	294	35	338	1013	585
合 計	3252						1971			
百分比	33.83%						45.83%			
五言八句	18	387	40	558	183	97	24	69	201	134
合 計	1283						428			
百分比	13.35%						9.95%			
七言四句	0	137	54	70	36	293	0	11	3	43
合 計	590						57			
百分比	6.14%						1.33%			
七言八句	3	30	26	22	8	90	0	2	2	6
合 計	179						10			
百分比	1.86%						0.232%			

表三十三相對忽略了時代因素，而主要從出經地點的不同，就五言四句等四種體式在中古前期南北兩個不同的地域的分布作了統計。從表中可以看出，五言四句南方高於北方十二個百分點，五言八句北方則高出南方三·四個百分點，七言四句和七言八句北方分別比南方高四·八一、一·六二八個百分點。這一結果與上文分別從體制和句式角度統計所得出的初步結論——近體詩的五言體和四句式可能源出南方，七言體和八句式可能源出北方——並不矛盾。因為，就體制而言，南方四句式 and 八句式的五言體佔到了五五·七八%，



北方則為四七·一八%，五言體的比重南方仍要高出北方；而北方七言體的優勢在四句式 and 八句式中都得到了反映。就句式而言，南方五言體和七言體的四句式佔到四七·一六%，北方則為三九·九七%，四句式南方仍然高出北方；北方五言和七言體的八句式佔一五·二一%，南方則為一〇·一八二%，八句式北方仍然高出南方。

結合上文就體制和句式的統計分析及表三十三的數據，筆者認為可以從漢譯偈頌的體式特點來推論中古詩體的一般狀況。嘗試論之，漢譯偈頌的四種主要體式在南北文化中應該都存在著，祇是其所佔比重表現出了一定的差異。五言四句體式主要成熟於南方文化之中，這從表三十四所列這一體式在早期譯偈中的比率獲得進一步的體認。五言四句在後漢譯偈中佔一五·六二五%，而在三國譯偈中達到了一七·五〇%，這一比率高出後漢近二個百分點，甚至也高出了之後西晉譯偈四·三一一個百分點。而在中古前期南北兩地時斷時續的文化交流之下，這種體式在北方也被普遍使用。

七言四句體式，後漢、三國譯偈未見，最早出現於西晉·竺法護譯經中[註 24]；東晉所有十一首主要出現在法顯參譯或主譯經裡，出經年代也較遲[註 25]。上涉兩位譯家，竺法護為敦煌人，法顯為平陽人，均屬北方。結合表三十三，可以確定，七言四句這體式主要生存於北方文化之中，並且在南方譯偈中未能得到較為廣泛的使用。

五言八句體式，主要成熟於北方文化之中，在後來的南方譯偈也有一些反映。據表三十四，在早期譯偈中，五言八句在後漢的一八·七五%、在西晉的二三·四一%，都要明顯高於以東吳為中心的三國譯偈的一二·〇〇%，這些數據顯然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七言八句體式，與五言八句情形相近，它也是成熟於北方文化之中的。據表三十三，七言八句最早出現於後漢和西晉，三國則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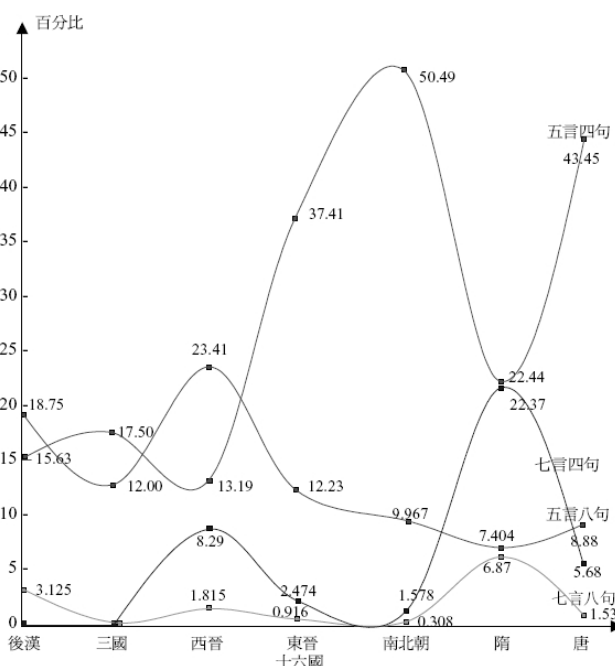
以上就漢譯佛偈所作討論，事實上也適用於中古詩歌的狀況。以五、七絕句的起源研究為例。有學者據中古詩歌的材料研究指出，五言絕句源於漢代，最早的五言四句體有〈長安為尹賞歌〉、〈巴郡人為吳資歌〉、〈漢末洛中童謠〉等，「南北朝樂府民歌的興起，為五言絕句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局面」；七言絕句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晉的七言體民間歌謠，西晉唯一的七言四句作品為〈豫州耆老為祖逖歌〉，西晉七言民謠「產地主要在洛陽，其次為并州、幽州、涼州」。[註 26]按中土早期的五言四句作品明顯兼及南北，而最早的七言民謠則集中於北方，這些與本文上揭五言四句體和七言四句體在中古時期漢譯偈頌中的發展大體相當。

圖三標示出了五言四句等四種體式在中古譯偈的發展曲線。從圖中可見，五言四句體式雖在中古譯偈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起伏也是最大的，高峰是南北朝時期，低谷則是西晉時期；起伏較大的還有七言四句體式，從後漢、三國的空白到西晉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高潮，之後又逐漸下降，經歷了南北朝的低谷，至隋卻達到了高峰；五

言八句體式則相對平穩，西晉是其高峰，之後緩慢下降，同樣在隋到達低谷，至唐略有提高；與前幾種體式相比，中古譯偈七言八句的發展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較為平穩。

與圖一反映的中古譯偈五、七言體制的發展特點相近，在圖三中，西晉和隋是中古譯偈主要體式變動最為集中的兩個階段。西晉各種體式在中古譯偈中的比例，五言八句是最高的，五言四句則恰是最低的，七言四句是第二個高點；隋代，七言四句最高，五言八句最低。與圖二反映的八句式譯偈在唐代為中古最低的情況相近，圖三表明，唐代譯偈中，五言八句和七言八句兩種體所佔比重都不高，而五言四句和七言四句也都不是中古最高的。

圖三：中古譯偈主要體式的演進



### 五、結語

本文關於漢譯偈頌五、七言體和四、八句式在中古時期的地域特徵及歷史演進軌跡的研討，事實上已經觸及到了古代近體詩的四種主要體式——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七言四句、七言八句的起源及發展的問題了。漢譯偈頌雖源於梵胡文本之經典，但可視為譯家創作之詩歌作品，這一創作的現實基礎則應是古代譯家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而近體律絕的產生和演變與漢譯偈頌有著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古譯偈是可以作為研究近體詩問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參照系來加以關注和研討的。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在資料保存的完整性上，漢譯偈頌要遠遠超過中古詩歌，尤其唐代以前。舉例來說，在中古詩歌研究領域裡，十六國和北朝是作品傳世甚少的兩個時期，而由於歷代重視對佛教文獻的保存，也就為我們討論這兩個歷史階段的漢譯偈頌甚至詩歌面貌提供了相對豐富而且可信的資料。

本文就漢譯偈頌所作的中古詩體發展特點的討論，似乎比簡單地從舊有的中古詩歌的材料出發所作的研究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貌。比如，漢譯偈頌的數量，五言四句在後漢有十五首，三國有三十五首，西晉則高達二百一十八首；七言四句在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中就有一百零五首。時代方面，竺法護譯偈中的七言四句遠遠早於〈豫州耆老為祖逖歌〉；而作為七言四句體式的基礎，七言體譯偈在後漢計十九首（其中三首為八句式），出現於支婁迦讖譯《佛說般舟三昧經》、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中，其時代也要早於人們經常談到的古代最早的七言詩——曹丕的〈燕歌行〉。有鑑於此，漢譯佛偈的詩學價值及其詩歌史意義值得作進一步深入的探究。

## 【註釋】

[註 1] 比如以下二十一首偈：

祭祀火爲上，諷誦詩爲上。人中王爲上，眾流海爲上。星中月爲上，光明日爲上。上下及四方，諸有所生物。天及世間人，唯佛爲最上。欲求大福者，當供養三寶。（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十五，《大正藏》第一冊，第一〇一頁上）

有作火祠者，一切自謂上。王者人中尊，海爲眾流本。星宿中月明，日者晝垂光。上下所往來，所事謂萌類。天上及世間，佛道爲最尊。（東晉·曇無蘭譯，《佛說寂志果經》，《大正藏》第一冊，第二七六頁上—中）

咒火第一齋，通音諸音本。王爲人中尊，海爲江河長。月爲星中明，明照無過日。上下維諸方，及一切世間。從人乃至天，唯佛最第一。（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四十一，《大正藏》第一冊，第六八九頁下）

於諸大會中，奉火爲其最。闍陀經典中，娑毘諦爲最。人中王爲最，諸河海爲最。諸星月爲最，諸明日爲最。十方天人中，等正覺爲最。（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五，《大正藏》第二冊，第三十七頁中）

婆羅門經書，祠祀火爲最。外道典籍中，婆比室爲最。於諸世人中，王者最爲首。百川眾流中，巨海名爲最。星辰諸宿中，月光名爲最。於眾明之中，日光最爲最。上下及四方，世間及人天。諸賢聖眾中，佛最第一尊。（失譯人名今附秦錄，《雜阿含經》卷三，《大正藏》第二冊，第三九一頁中）

於諸大祀中，祠祀火爲上。婆羅門書中，薩婆底爲上。一切國土中，人王最爲上。百川眾流中，海水最爲上。列宿麗于天，月光最爲上。一切眾明中，日光最爲上。十方世界中，佛爲第一尊。（失譯人名今附秦錄，《雜阿含經》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冊，第四六五頁上—中）

祠祀火爲上，詩書頌爲首。人中王爲最，眾流海爲源。星中月爲明，光明日最勝。上下及四方，諸地所出物。天及人民類，佛爲無上尊。欲求其德者，三佛爲最上。（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三十，《大正藏》第二冊，第七一七頁上）

祠祀火爲上，眾書頌爲最。王爲人中尊，眾流海爲上。眾星月爲首，照明日爲先。四維及上下，於諸方域境。天與世間人，佛爲最尊上。欲求其福者，當歸於三佛。（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九，《大正藏》第二冊，第五八九頁中）

祠祀火爲上，詩書頌爲尊。人中王爲貴，眾流海爲首。眾星月爲上，光明日爲先。八方上下中，世界之所載。天及世人民，如來最爲尊。其欲求福祿，當供養三佛。（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冊，第六三七頁下）

祀祠火爲上，諸論頌爲首。王爲人中尊，海爲眾流源。月爲星中明，日爲眾明最。八方及上下，所生萬品物。欲求其福者，三佛最爲尊。（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二十五，《大正藏》第二冊，第六八四頁上）

祠祀火爲上，書中頌爲最。王爲人中尊，眾流海爲源。星中月照明，光明日爲上。上下及四方，諸所有萬物。天及世人民，佛爲最尊上。欲求其福者，當供養於佛。（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二十六，《大正藏》第二冊，第六九四頁下）

祠祀火爲上，經書頌爲最。人中王爲尊，眾流海爲首。星中月爲先，光明日第一。上下及四方，諸所有形物。天及世間人，佛者最爲尊。欲求其福者，供養三佛業。（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四十，《大正藏》第二冊，第七六八頁中—下）

祠祀火爲上，詩書頌爲最。人中王爲尊，眾流海爲源。星中月爲明，光明日爲上。上下及四方，一切有形類。諸天及世間，佛爲最第一。欲求其福者，當供養三佛。（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四十一，《大正藏》第二冊，第七七五頁中）

祠火最爲首，詩頌亦爲首。王爲人中首，眾流海爲首。眾星月爲首，光明日爲首。上下及四方，諸所生品物。天上及世間，佛最無有上。欲求種德者，當求於三佛。（西晉·釋法炬譯，《頻毘娑羅王詣佛供養經》，《大正藏》第二冊，第八五六頁下）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爲最。一切眾流中，大海爲其最。於諸星宿中，月光爲其最。一切光明中，日照爲其最。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爲最。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大正藏》第三冊，第六四七頁中、下，六四八頁上、中）

祭祀火爲最，諸偈歎爲最。人中王爲最，諸流海爲最。星宿月爲最，諸明日爲最。上下及四方，及於眾生輩。若天若人者，諸佛是爲最。（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五，《大正藏》第三冊，第九〇九頁上）

外道所修事，精懃火爲最。學問日益明，眾義通爲最。人中所歸仰，遮迦越爲最。江河泉源流，大海深爲最。眾星列空中，日月明爲最。佛出於世間，受施爲上最。（後漢·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下，《大正藏》第四冊，第一六三頁中）

一切天祠中，奉事火爲最。一切異學中，薩婆帝爲最。一切眾人中，轉輪王爲最。一切眾流中，大海水爲最。一切照明中，日月光爲最。天上天下中，佛福田爲最。（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二頁中）

一切天祠中，供養火爲最。婆羅門書中，薩毘帝爲最。一切諸人中，帝王尊爲最。一切諸江河，大海深爲最。一切星宿中，月明第一最。一切照明中，日光爲上最。十方天人中，佛福田爲最。（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一〇〇頁中）

諸祭祀中火爲上，韋陀之中神爲上。世間所尊王爲上，一切眾流海爲上。諸星宿中月爲上，諸耀之中日爲上。上下四維及天等，供養世尊最爲上。（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一，《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一五八頁中）

梵志事火，續爲目佉，梵經四部，章句爲首。諸人民中，以王爲首，眾水流河，以海爲首。星列空中，月爲其首，眾熱之中，以日爲首。上下四域，所有諸方，兩足人天，三佛爲首。（姚秦·竺佛念譯，《鼻奈耶》卷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八六七頁上—中）

以上各偈的內容相近，但文字上有一些區別，故我們分別視作一首偈。

- [註 2] 唯《戰鬥品》帝釋所說一偈，二經在體式上有些微區別，《起世經》譯作五言四十句，《起世因本經》作五言三十六句七言四句。見《大正藏》第一冊，第三五一頁中—下、四〇六頁中—下。
- [註 3] 分別見《大正藏》第十四冊，第七七一頁下、第二冊，第三七〇頁中。案《祐錄》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有《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一卷（原註：抄），當即入藏之《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考《房錄》卷六亦有此經，云法炬出，且云《祐錄》不載，是《房錄》失考。藏經題法炬，亦緣《房錄》，或誤。
- [註 4] 馬鳴造、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劉宋·釋寶雲譯《佛本行經》，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文殊師利發願經》，唐·不空譯《普賢菩薩行願讚》、《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佛說出生無邊門陀羅尼儀軌》，毘舍佉造、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闕譯人名今紀後漢錄《後出阿彌陀佛偈》，唐·不空譯《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唐·慧智譯《讚觀世音菩薩頌》，唐·義淨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唐·玄奘譯《廣百論本》，唐·義淨譯《觀總相論頌》，唐·義淨譯《止觀門論頌》，陳·真諦譯《寶行王正論》，劉宋·求那跋摩譯《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劉宋·僧伽跋摩譯《勸發諸王要偈》，唐·義淨譯《龍樹菩薩勸誡王頌》，唐·義淨譯《一百五十讚佛頌》，苻秦·曇摩難提譯《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等。
- [註 5] 《大正藏》第三冊，第三八七頁中—三八八頁上。
- [註 6] 同 [註 5]，第七八八頁下—七九〇頁上。
- [註 7] 《祐錄》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八十頁下、八十一頁中。
- [註 8]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三十一頁上。
- [註 9] 同 [註 8]，第三十九頁中。
- [註 10] 同 [註 8]，第九十八頁上—中。
- [註 11] 《大正藏》第三十二冊，第四八三頁上。
- [註 12] 漢譯偈頌中，二句式為一千零九首，數量也很大。但與二言體在漢譯偈頌中的情況相仿，一句、二句式偈頌也主要集中於論藏典籍中，它們的出現主要是由原著者摘錄經藏典籍中偈頌的部分內容造成的。因此，嚴格來說，一句式、二句式的作品並不能算完整的一首偈頌（其中七言二句屬例外，因為在譯偈中存在以七言二句為一個偈頌單位的現象）。故而本文對這兩種句式暫不作討論。
- [註 13] 關於佛經偈頌的翻譯體例，一般認為譯偈皆以每四句為一個偈頌單位（一偈），其實這是一個莫大的誤解，除四句、八句外，尚有以二句、六句、十二句為一偈者。筆者擬另文詳加探討，此不贅。
- [註 14] 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呂澂佛學論著選集》（濟南：齊魯書社，一九九一年）第三卷。
- [註 15] 《祐錄》支謙有《須賴經》；白延有《叉須賴經》，原註闕。《呂錄》云應支謙譯，今從。
- [註 16] 《呂錄》云：「（新）無量壽經二卷。劉宋·寶雲譯。永初二年出（祐）。後誤康僧鎧譯。」案此有誤。查《祐錄》並未交代寶雲所譯《無量壽經》的出經時間，考《房錄》卷七著錄東晉·佛馱跋陀羅《新無量壽經》二卷，云：「永初二年於道場寺出。見《寶唱錄》。」《呂錄》涉佛馱跋陀羅譯本致誤。
- [註 17] 《祐錄》失譯，《開錄》曇無蘭。《呂錄》云「今附吳魏錄」，今從。

- [註 18]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五十九頁。
- [註 19] 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僅有偈三首，分別為四言八十句、五言四十四句、五言一百二十句，與三國譯偈的整體特點不相符。
- [註 20] 後漢譯經時間可考者，安世高《佛說七處三觀經》於桓帝元嘉元年出，康孟詳《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於獻帝建安十二年出。
- [註 21] 鄴下文人集團正式形成於建安十三年，參見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四頁。
- [註 22] 釋道慈，《中阿含經序》云：「《中阿含經記》云：『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毘曇》、《廣說》、《僧伽羅叉》、《阿毘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眾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稀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毘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祐錄》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六十三頁下—六十四頁上）據此，本文視作前秦譯經加以統計之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僧伽羅刹所集經》、《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僧伽提婆共竺佛念譯《阿毘曇八犍度論》、曇摩難提譯《增壹阿含經》（《大正藏》題東晉·僧伽提婆譯，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云：「今勘係僧伽提婆修正。」）等數經，可能後來都曾經過修正。
- [註 23] 《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文章流別論》。
- [註 24]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二首，《修行道地經》一百零五首，《生經》十首，《正法華經》一首，《佛說普曜經》十八首。這五部經，據《祐錄》和《房錄》，出經時間分別為泰始五年（二六九）七月二十三日、太康五年（二八四）二月二十三日、太康六年、太康七年八月十日、永嘉二年（三〇八）五月。
- [註 25] 其中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三首，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六首，失三藏名今附東晉錄《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二首。前二經，據《祐錄》，分別於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十一月、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出。
- [註 26] 參見葛曉音，〈初盛唐絕句的發展：兼論絕句的起源和形成〉，《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五七—三六三頁。